

引言

李貞慧*

面對過往的文學傳統，人們常會經過一個再理解、再詮釋的過程，而後落實於當代書寫或日常的文化實踐中，不僅形成時代間的對位、交融或悖離，也可能促成文類界線的挪移或變動，進而使「文學」有重新反思及定義之必要。然而中國傳統文學，在今日的臺灣，其「當代性」為何？是否仍有足夠的創新力度，以回應「當下此刻」所處的文學或文化環境？《文心雕龍》所說的「文變染乎世情」，「文變」是否仍可能以中國傳統文學為底色？

帶著這樣的叩問，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文論中心首先於 2021 年，由玉山學者陳國球教授、台積電講座蔡英俊教授、李貞慧、許銘全、簡良如等人組成研究團隊，執行國科會三年期整合型計畫「中國文學『詩性』之研究」，以「詩性」(poeticity) 為核心觀念，探討此一命題。「詩性」一詞雖借用自維柯 (Giambattista Vico, 1668-1744) 的「詩性智慧」(poetic wisdom)，但團隊並未停滯於文明起源或神話、想像、譬喻、象徵等特定的美學範疇中，亦不專指一種文體，我們的研究重心，正是立足於「當代」——既是作者，也是各個讀者的「同時代」——換言之，我們認為「詩性」應是一種不斷重複的，對於生存處境的思考，以及生命形態的呈示，因之得以成為文學的本質，而在各個不同時代的論述 (discourses) 中浮現出來，文學風景因之得以變化，亦得以貞定其恆常不變處，我們希望探究這樣的「詩性」，以思考並回應當今的文學問題。2024 年 10 月，清華大學中文系及文論中心即在前述基礎上，籌辦「詩性與文變：傳統文學的當代性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本專刊主要即是此次會議所發表之論文，經嚴格審查後之成果。

全編共收文七篇，其中簡良如、大平幸代、許銘全、陳國球以古今詩歌詩學作為研究主題，雖然本刊並不以單一文體，也不以線性單向的文學歷史論述為目標，

*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，電子郵件信箱：jhlee@mx.nthu.edu.tw，ORCID：https://orcid.org/0009-0004-5792-210X

但這些討論，仍可略見自《詩經》以至現代對詩歌本質的重要思維向度，以及若干「文變」的樣貌。劉苑如以七世紀的佛教文本、楊中薇以明清小說、劉正忠以近代小品文，則是跨文體、跨領域的探求，茲略述如下。

簡良如〈《文心雕龍》詩史分析〉從經學角度詮釋《文心雕龍》的詩學歷史建構。其理論基礎為：中國傳統的經學認為存在永恆真理（常道），經典即真理的載體，經學家著重客觀文學本源之探求，《文心雕龍》因此即在「原道」、「宗經」的前提下，透過多層次的結構性探究，展現文學制作的極致，並揭示文學歷史的必然理路。在經學的思想中，《詩經》既為經典，即為人文本源，即為人文典範，因此「詩」並不是肇始於初民，而必須待智思成熟，語言載體具備，加以人類經驗的悠長累積始能作成。這樣的經學理解，和當今以個別經驗為視角的創作理論，似乎扞格，不過我們亦不能否認，這項「事實」是經歷代文人不斷回溯而建立起來的。陳國球教授認為，這其實「是站在『歷史之後』的位置所匯聚而成的論述」，著重的是其作為研究開端的方法及可能的「轉換性」，這是十分精采的評述。另一方面，詩以「言志」為樞紐，「志」是因「心」對人的存在的深刻體會與反身自省而發，詩歌創作的本質，因此不離人類存有之道的大問題，作者認為，這是《文心雕龍》對「詩性」來源的理解，也是聯繫個體文章與聖人典範的關鍵，而「個體」與「典範」之間的距離，也成為文學「通變」的重要判準。

杜詩是中古以下中國詩歌之典範，「興」則是中國抒情傳統論述的核心命題。許銘全在肯認抒情傳統論述「觸物感興」或「因事感興」的情況下，從杜甫（712-770）詩歌本身及同時代詩歌理論，以及後人對杜詩的詮解中，敏銳的察覺到「意興」這一情感及創作狀態的存在。正如文中所說，「感興」強調的是一種心、物之間當下、偶然相值的直覺觸引，通常未經理性的思索安排，這樣的「興」，普遍存在於中國詩歌之中，杜詩中亦所在多有。然而在亂離憂世的情況之下，「興」可能更常呈現為「意興」，即一種長期存在、本有內蘊的心緒狀態，不但更明確的指向「人事」，創作當下，亦不見得必有具體事物的啟引，杜詩中的「遣興」多是此類，作者甚至認為，杜甫的名作〈秋興八首〉，「感興」之外，若能從「意興」的角度理解，可能更能體會其「動情盪氣」的抒情世界。這樣的「意興」說，既直探詩歌創作本源，也觀照了「世變」之下的詩學變化與實踐，對傳統詩學或抒情傳統論述可能引發的反響，將是本刊所樂見。

學習前人作品，或利用各種互文方式向典範致意，本即是文學承衍新變的方式之一，然而中國中古以下「擬古」詩的出現，鍛鍊技藝之外，常有更強烈的經驗借

代或與自身境遇對位互勘之意，大平幸代的文章，即觀照了「擬古詩」大量出現的劉宋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：劉宋文人利用詩賦、傳說、學術建構對「建安」的想像，形成時代共同的認同與符碼，以及共享的創作資源，於是在諸王幕府中，一個理想的「古」之世界，一群彼此心照不宣、可以互相托「古」抒懷的今人，得以藉著與「建安」相關的擬古詩，共同傳達了時代的聲音。楊中薇的文章則以十八世紀三部小說為本，藉由士、伶階級的交錯、流動，呈現另一種時代與認同的問題。傳統伶人處於社會階級之邊緣，但在古典的書寫中，卻常出現在與政治或國家興亡的宏大敘事中，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、《五代史·伶官傳》，或明清之際的戲曲《桃花扇》，皆是如此。本文討論的《歧路燈》等三部小說以明清的禮教社會與商業流動戲班為背景，士人與伶人之間交織著秩序與游移、禮法規訓與狎玩僭越的矛盾，小說中甚至編入戲曲文本，以描繪當時的社會實況，投射小說作者的文化想像，這就使其與前述的家國敘事產生了區別。這是一般讀者較熟悉的，體察、取資當代社會，作為文學創作之素材的作法，既呈示時代或「日常」生活的某些切面，又以此隱喻當代文化與倫理之困境，自然可作為觀察中國傳統文學「文變」的重要一環。而文體、身分與內容的多重越界，顯然又已蘊含著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開展的新動能。

〈唯情、去情，與世情：由宋奇到宋淇的情感詩學〉、〈小品文是民國的產物——體制、文類與範式〉二篇文章，一談詩，一論文，則是在現代的視野下，從不同的角度思考文學。陳國球教授是抒情傳統論述大家，他以「情感詩學」為主軸，爬梳 1949 年南來文人在香港的代表性人物宋奇（1919-1996，較知名的筆名有宋淇、宋悌芬、余懷、林以亮等）包括詩歌、翻譯、批評等文學活動，暢論宋奇如何從早期的「唯情」、「唯美」，在古今中西的上下求索，尤其是飽諳喪亂的流離沉鬱之後，逐漸澄定其以「情感」、「含蓄」為本質的詩學思考與文學表現，成為「理解大時代變動下文學生命的流轉與傳承變奏過程的一個樣本」，光彩流轉，實不做第二人想，掩卷之際，也正如其文末標題所提示或暗示的「餘情未了」，不免令人懷想萬端。劉正忠則從體制、文類與範式三個概念，追索近代「小品文」興發的「時代語境」以及文體性質，其中，「王綱解紐」無疑為現代小品文發展最重要的因素。君主體制的解體，無論從精神或從政治、社會層面而言，的確都足以使著重於政教應用的傳統「古文」書寫體系，大半陷於癱瘓；而被郁達夫（1896-1945）視為五四運動最大成就的「個人的發見」，不僅給予現代散文滋長的養分，更成為民國初年文人聯繫「小品文」與晚明小品或英國隨筆體（essay）的重要鋪墊。劉正

忠利用原始史料，不僅釐清近代小品文與二者的關係，更引進日本明治文人對西方隨筆的融會和實踐，以及與小品文同時共生的「雜文」以為對照，進一步逼顯小品文的文學性格，並為近代小品文的興起與發展，勾畫出更清楚的圖象。他的研究，實為包含小品文及「雜文」在內的現代散文，開啟了更多值得探討的空間。

劉苑如的文章以七世紀的宗教文本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為論述中心，雖然並非與文學直接相關，然以佛教本土化為目的，回應特定時代與地域的宗教史敘述手段，實則處處可與文學並參。如融鑄佛教教義、本土文獻、傳聞、或親見以形塑當地、當下的神聖體驗，建構本土的宗教歷史。又如佛教非線性的時間觀，使感通故事中的生命與神聖經驗可一再召喚、重返，以不同的物質或精神形式賡續或再建，「滅而不滅」，如此，記憶便不只是過去的再現，亦成為理解當下的底蘊，對未來的追尋，在可召喚、重返的時間結構下，往往亦需追溯往昔以為啟動的基礎。換言之，記憶、追憶不只是「在缺席中延續其在場性」，更是如阿甘本 (Giorgio Agamben) 所說的感知斷裂與失落、進入屬於自己的「當下」(Jetztzeit) 的開始，交織著對層層堆疊的過去的洞察力，並由此湧動、展延著對未來的期許與想像。要之，在本文的詮釋下，「當代性不是一個單一的歷史時間，而是一個複雜的時間存在結構」，在世俗與神聖兩端，同樣具有無限再生與開啟的動能，這對文學，無疑亦是深富啟發性的。

本刊之勝義紛陳，從上文的梳理中，或能略見一斑，而傳統文學的「詩性」與「文變」，自然也還有無限廣袤的探索空間，但我們期待，這樣一次以「當代性」為念，卻不汲汲迎合或論辯「當代」的展示，可以下自成蹊，吸引更多傳統文學的探訪者，於此地、此時，成為理解文學、揮灑當代文學風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寶藏之一。